

温州文史论丛

钱志熙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温州文史论丛

钱志熙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文史论丛/钱志熙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8

ISBN 978 - 7 - 5426 - 4249 - 3

I . ①温… II . ①钱… III . ①文史资料—温州市—文
集 IV . ①K295.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28332 号

温州文史论丛

著 者 / 钱志熙

责任编辑 / 杜 鹃

装帧设计 / 鲁继德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大伟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 - 24175971

印 刷 /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 × 1240 1/32

字 数 / 390 千字

印 张 / 1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249 - 3/K · 221

定 价 / 48.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 66019858

前　　言

有关温州文史的研究,对于我个人来讲,是近十余年来新开辟的一个研究课题。此前曾发表过《谢灵运〈辨宗论〉与山水诗》(《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5期)一文。谢氏的《辨宗论》是中国早期佛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而其产生的起因,正是与永嘉诸道人辩论求宗之顿渐而作的。以我现在的思维方式来看,这篇论文中蕴藏着重要的地域文化信息,对于了解晋宋时期温州地区佛教及佛学的发展情况,可以说是具有重要的价值的。我们知道,温州本土的文化创造事实,在两宋诸子兴起之前,是极为罕见的。唯有玄觉道人当禅宗兴盛于两湖、广东之际,独立崛起于东南海角,远赴曹溪谒见六祖慧能,在一问一答之间了悟顿教,留宿一夕而返,得“一宿禅”之盛誉。初看起来,像是温州学术的破天荒,但联系前此四百五十多年前发生在永嘉郡内的永嘉诸道人与谢客辩论宗极,就可知道玄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且,同是倡扬顿教的谢灵运《辨宗论》与玄觉大师的佛学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渊源的关系呢?这种渊源关系如果存在,也很可能是以地域文化传承的方式造成的。或许可以这样推测,温州郡内,存在着一种顿教的传承。此事正可见古代温州地区佛教与佛学积淀之深厚,欲求温州佛教之发展历史,应该从《辨宗论》及其所载的永嘉诸道人的佛学思想开始。但是,当时的思考方式还是着重于文本本身,只将其放在晋宋之际佛学发展的大背景上来认识。尽管我现在还不能对《辨宗论》与晋宋之际的温州地域佛学作出新的诠释,因为这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要运用宏微结合的方法做较长时间的

探索。但是,反思这样的例子,我不得不承认,自从近十余年新开辟有关温州文史的研究领域以来,我的思维方式因引进地域这一重要的范畴而有所调整。这种调整,不知学界同仁会怎样看待,我自己坚信对于个人学术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

地域的观念在学术上的反映,其来甚远。《尚书》有《禹贡》篇,《逸周书》有《王会》篇,《周礼·夏官大司马》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与其财用、九谷、六畜之数要,周知其利害”^①。这些都是从大一统的政治观念出发的地域划分,是由统以观分,目的在于由分而归统。近期中央文史馆正在编撰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也可以追溯到这个传统。这也构成传统地域研究的一种思想,即地域文化的研究,是在大的文化整体中来研究各具体地域内部的文化历史与文化状态。这个文化整体,我们现在习惯上将其定位为华夏文明或中华文明。鉴于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是一个统一的文明中各地域文化的发展,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有密切的互动关系,所以对各具体地域文化的研究,必须参照更大的文化体系。从整体观察局部,同时又从局部来更好地解释整体,地域文化研究的意义即在于此。这也是我在研究温州地域文化的一些具体问题时坚定执持的一种理念。这种方法,在地域文学史的研究中尤其重要。我们知道古代的文学,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民间的文学,是一种原始生态的自然艺术性质的文学,它其实是文学的真正原始性状,也是文学之根。另一部分是文人的文学,亦即我们习惯所说的古典文学。民间文学与地域的关系之密切自不待言,比如迄今没有得到很好研究的温州地区民

^① 《周礼注疏》卷三十三,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第 861 页。

间歌谣与民间故事，就属此种，其中反映的瓯貉风情与土宜，有许多值得我们深入解读的地域文化信息。后一种文人文学，却是属于古代文学的整体之中，但地域的文化因素也对其发生影响，如永嘉四灵的诗歌中就包含诸多地域因素，包括地域诗学传承、地理背景、地区政治与文化条件等。很显然，我们在研究后一种地域文学时如果不是在古典文学的整体中搜讨其地域因素，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封闭的事实来研究，其偏差自不待言。事实上，就地域文学而言，上述的两分法也是相对的。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民间文学与典雅的文人文学之间也是互动的。不仅已经被广泛认识到的民间文学对文人文学的影响是一个层面，民间文学受文人文学的影响，将文人文学民俗化，也是一个重要层面。关于后一方面，我们的研究还是很少的。就温州地域文学而言，比如宋元之间流行的南戏、从清代流行迄今的温州鼓词，其艺术的形式属于民间的娱乐，而创作的主体中则有文人的加入。如鼓词经常以《千家诗》中作品为定场诗，就是雅文学在通俗文艺中的使用。可见，在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如果在确定地域的同时，不同时确定地域文化所依存的整体，即更大的文化传统，其事实真相的呈现也会受局限，其研究价值也会受局限。只有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研究地域文化，在大小传统的相互影响等多重关系中研究地域文化，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与事实才能得到有效的解释。

当然，无论是作为一种对象选择方式的地域文化研究，还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地域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中最关键的词汇当然就是地域。我们知道，地域文化是相对于文明整体而言的。其主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某一具体地域内部发生的各种文化现象、文化事实、文化成果。我们这里所谓的发生，是指历史与现实两方面而言。而且历史的一方面显然是地域研究的重点。这也是作为文史研究课题的地域文化研究与一般的区域文化、区域经济等当代研究的不同，尽管两者是有联系的。那么，地域研究的单

元或说是空间范围,又是怎样确定的呢?目前的基本做法,是以现有的行政区划为地域文化研究的基本单元,如以省、地区(市)、县,甚至乡、镇为单元,对该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历史文献、考古发现、风俗传统及各种地域内部传承的工艺、美术等进行整理与研究。这种做法,不仅有现实的条件与目的,也有传统学术方面的依据。我国自魏晋以来,记载各地地理、风俗、人物的地志就不断涌现,并且以地域文献的编纂为主要方式,自然地形成了一些文献板块。但是,如果地域文化研究简单地停留在依据行政区划确定各自范围层面上,其学术价值就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所以,在更高的层次上确立地域文化研究的板块,并且展开地域文化之间关联与比较的研究,将是更具胜境的一种境界。收入本书的《论历史上温州地域文化的发展》,就尝试将历史上的温州地域文化放在与其北面的于越文化及南面的闽越文化的关系中来把握。同样,在研究四灵的诗学时,我们强调南宋后期温州诗学与同期的江西、湖南诗学风气的关系。至于永嘉学派的研究,更应该在浙学的背景上把握。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地域文化研究,应该是以地域文化的解读为核心,向整体文化及相关地域文化辐射的一种十分活跃的思维方式的体现。并且,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引导下,有可能超越现行的行政区划,重新整合地域文化研究的各种大小单元。比如,温、台、处(丽水)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的单元,是在多种文化现象上都表现出来的。且别说秦汉之际的东瓯国是跨越这三个地区的,即以人们的活动范围而言,三地也构成一个大的活动范围。就北边而言,太平、黄岩、仙居与乐清、永嘉的商业往来十分频繁,而温州的商业对丽水的辐射也是很频繁的,俗话说:“担盐过缙云,一天一天的银”,就很形象地展示了这一点。流传的高机、吴三春的爱情故事,同样也是以温、处两地的商贸活动为背景的。另外,如温州地区也广泛流传的盘古神话,与畲族的《盘王歌》、盘古信仰,似乎也是有关系的。像这样的跨越各地

域之间的文化现象，在温州地域文化中还可以举出许多，如闽、瓯两地在风俗、信仰上的影响关系之大，也是需要我们进行跨地域的研究才能解释清楚的。如果这样理解地域文化研究的内涵，可以说地域文化研究真正是一种能够“无穷出清新”的胜境。

二

温州的地域文化研究，无论从历史与现实来看，都有十分广阔的空间。在我国众多历史地形成的地域文化单元中，温州可以说是最具地域文化的典型特点的一种。温州一带在商周时代就已出现瓯人族群，并且被纳到东周朝贡体系之中，其文化带有海洋文明与山地文明交融的特点。同时，以沿海几个小小的冲积平原为平台，以山海之利的交互为主要形式，温州可以说在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一种商贸的传统。这些都是构成温州地域文化特点的重要元素。我们研究温州地域文化，恐怕首先要深入研究这类元素。如温州地区的巫风之盛以及三教杂糅的宗教信仰方式，在历史上可以追溯到上古东瓯王时代好祭祀的风俗。历史上摩尼教、伊斯兰教都曾在温州流行，这与其处于海滨，善于接受海上传来的文明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在佛教的传播方面，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温州乃至东南沿海，很可能有一条海上的通道。温州文明通过海上航行传来的成分，大概要远大于陆路传来的部分。即使在近今的时期，我们也能感觉到，近代以来温州的外来文化主要也是通过海路由上海传来。所以近代的上海，也是温州人进出国内外的重要中转，是温州人活动的主要舞台，其与温州之关系，实较省会杭州更重要。现代沪上的绘画中出现温州画派，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温州因山海之利的频繁交通而形成深厚的民间商贸传统与市民文化。温州历史上民间宗教、戏剧、工艺的发达，也与商贸传统与市民文化密切相关。这种商贸传统，使得温州人在接受中华民族普遍的价值观念之外，还形成一种义利兼重的价值观

念。永嘉学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这种价值观，如叶适关于义与利、道与情的思想就是这样：“‘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又云：“和洽言：‘古之大教在通人情。’所谓不以格物者也。又曰：‘勉而行之，必有疲瘁。’疲瘁二字，深得其要，故古人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①当然永嘉学派的主体是儒家价值体系，其学术的基本性质也是传统的经史之学，是儒学中重视现实价值的一派。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的文明、大的思想传统在地域土壤中的重新培植，并形成新元素反馈整体的文明。南宋以后，永嘉学派对整体学风的辐射虽然减弱了，但在温州地域内部，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永嘉学派有一个清晰的内部传承的脉络。明清两代温州地区预流的政治家与学者，如张璁、赵士桢以及近代的永嘉诸子，都是自觉地传承南宋的永嘉学派，甚至现代温州的文史学者与科学家群体，也都是在永嘉学派的传承脉络上的。这种传承之所以能够实现，与温州地域文化的上述固有元素是分不开的。只要这种固有元素存在，温州地域文化的整体性就能延续。当然，它在思想与文化的发展上是否也具有消极的一面呢？我想肯定也是存在的。

比较理想的地域文化研究，应该是在寻找地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对地域内部发生的各种历史文化现象进行多学科、综合性的研究。近期以来，学术界提出了一种以地域文化研究为对象的、新的学科标目方式，如徽州学、潮州学。温州地区的文史学者，也在跨入新世纪之顷，提出了温州学的说法。其实这是以地域为基本范畴的多学科的、综合性的研究。从地域内部的成员来说，这种地域性学科的建立，当然是为了地域内部的文化与学术

^① 《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第三册，第 1774、1777 页。

的建设。有许多历史文化成果，在大的范围中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在地域内部却曾有经久的影响。比如一部中国文学史，其所叙述的对象，基本上是局限于传统的大家、名家及重要的文学流派层次上。大量的地域内部有影响的文学家，不可能进入传统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但是，真正说来，并不存在一个只封闭在大家、名家以及重要的文学流派之内的文学史。我们知道，杜甫的诗学有一个家学的背景，这个家学背景，除了其祖父杜审言之外，还应该包括其他的杜氏家族成员。同样，颜真卿的书法艺术，也是与颜氏家族的书法传统相关的。至于本书所研究的永嘉四灵的诗学，其实也有很丰富的地域与各自家族的文化传统。比如四灵中翁卷的家族，就有多名诗人出现。这样的例子是到处都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流行的地域文学、家族文学的研究，是对迄今为止的传统的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所以，地域文化研究相对于传统的研究，不是简单的缩小范围、增加数量、填补空白，而是能够对传统的研究有所反馈，使文化史或文学史的研究趋于更加完善的境地。这是地域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目前的地域文化研究，对于其地域内部文化与学术的建设意义是比较清晰的，对于其在整个学术发展上的价值，则缺乏认识。这无疑是地域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其实不仅地域研究，即以近年同样兴盛的域外汉文学、汉文化研究而言，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

从提高学术价值的层面来讲，地域文化研究应该重视整体的地域文化研究理论的建树。并且，应该将此视为地域研究的一种重要目的。这方面，我想应该参照语言学中的方言研究的方法。语言学家并不以方言研究为小，是因为方言研究是语言研究中必不可缺的环节，并且是以语言学的整体为基础的。通过方言研究，来丰富历史语言学的内容，研究语言发展的规律。地域文化研究应该是这样的一种研究，即将地域文化作为整个文化的重要

部分,来探索文化生成方面的一些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化发展的所有事实与成果,都是具有地域性背景的,都可以用地域研究的方式进行。上面所论的温州历史文化中反馈、辐射到更大范围中的那些成果,就是这样。我们不妨再以宋代的学术与文学为例,宋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宋学与宋文、宋诗,都具有统一的精神与面貌,但是其内部的各家各派都具有地域的背景。即使其发生的地方是全城性的大舞台,也往往被回归到地域的背景下去认识。如元祐时期的学术与文学,都是在大舞台上发生的,却被冠以洛学、蜀学、江西诗派等地域的概念。南宋的闽学、浙学、永嘉学术等也是这样的。推而至于宋前与宋后的各代学术与文学,也不无如此。可见,在传统学术观念中,地域是人们区别各种学术流派、文学流派的重要因素之一。

地域文化研究正在兴起,但是它的特点是各自为政,划地分治,缺少相互的关注。在这里,缺少理论的深度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地域文化研究中只有自觉体现一种理论的关怀,产生理论的成果,才能为地域之外的研究者所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讲,各个地域文化研究的群体,都有为整体的研究创造理论、发凡起例的任务。古代成功的地域研究就是这样的,如孙诒让的《温州经籍志》就因其所建立的郡邑文献研究的体系与方法而成为一种学术经典。同样,章学诚撰修各地方志时所建立的方志学理论,也为史学贡献了重要的理论。

三

本书所收的论文,主要还是集中在传统的文史领域,所运用的也主要是传统文史研究的方法,只是尽量突出地域研究的特点。目前地域文化研究中,文献学的方法是主要的,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最大的。如近年内陆续出版的《温州文献丛书》,是继孙衣言《永嘉丛书》、冒广生《永嘉诗人祠堂丛刻》、黄群《敬乡楼丛书》

之后有关温州历史文献的重要整理成果。它无疑会对近期的温州文史研究起到推动作用。本书的一些个案研究之所以得以进行,也是以上述以《温州文献丛书》为主的温州地域文献、地区人物著述的整理成果为基础的。应该说,文献整理与考古、考据等方法应该被视为地域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但是本书有关温州文史的整体性研究与个案研究的论文,主要是运用文史学方面的综合研究方法。其中比较集中的板块有以下几个:

一是关于温州文化历史的整体的探讨。其中《温州学与温州研究》一文,是2003年1月参加温州学研讨会时写作的,当时的社科联主席洪振宁先生曾摘录其中一部分,发表在2003年的《温州日报》上。从那以后,我对温州历史文化的研究,一直尝试采用以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同时推进的方法。2007年撰写的《论历史上温州地域文化的发展》,则是又一次尝试对温州文化的发展历史做出整体性的描述。但作为整体的研究,这两篇论文的不足是很明显的,它们最多只能算是为温州文化历史勾勒出一个轮廓。比如对上古时期温州地域文化的具体面貌、唐代温州地域文化 的实际情况,都因缺乏资料而至结论肤浅。而且在考察的内容上,由于研究者个人的局限,没有将唐宋以降遗存仍然比较丰富的温州地区的工艺、美术、宗教诸项文献资料与文物遗存纳入到其中。还有在历史的脉络上,元明以来温州地域文化的发展,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尤其近现代温州地域内外温州人物的学术群体研究,也是一个庞大的研究课题。我想只有在上述各类的研究进行到一定的程度之后,才有可能对温州历史文化的整体作出逼近真相的描述。

二是关于温州文学史的个案研究。温州对文学史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两个成果——四灵诗学与南戏——都发生在南宋时期。可以肯定地说,南宋时期的温州学术与文学,构成宋代文化史的重要部分。《试论四灵诗风与温州地域文化的关系》、《南戏与温

州地域文化关系新探》，使用的是类似的方法，即尝试在地域的整体中重新审视这两个重要的文学成果的成因。《诗的国度、诗的家园》、《古代小说中的温州人形象》这两篇论文，不同于前此研究的地方，也在于尽量将元明以前温州的诗歌、戏剧乃至小说的历史，放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中梳理其基本脉络。至于宋以后温州文学的发展历史，本书很少涉及。宋以后温州文学史中也出现了许多预流的作家，对其文学成就的研究与评价，同样要放在整体的文学史中来把握。这方面的课题应该还是很多的。温州人的精神、气质，温州人的特点，不仅在现实的政治与经济的事务中体现出来，在文学中同样也体现出来。但是，文学之于温州历史文化的重要性，相比其他的地域，是主要的呢，还是次要的呢？从元明迄近现代，温州的文学成就，似乎整体落后于与其相邻的南、北、西各郡邑。在理学、心学与现代哲学方面也是如此。元明以后温州文化在空间上处于低谷状态的现象是否也可以从地域的角度得到解释？看来，我们对于文化与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起伏性等现象的研究，已经掌握到的理论是极其有限的。

三是关于永嘉学派的研究。永嘉学派是一个儒学流派，其贡献在经学、史学、文学和事功这样几个方面。它与当时流行的其他理学流派的不同，在于将学术与事功结合起来，其性理之学、经学、史学、文学都体现事功的目的。同期的反对者抓住其重事功的特点，将其简单化，称为功利之学加以贬斥，其实是有意曲解。但后来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永嘉学派的，也都简单地认为永嘉之学为功利之学。如全祖望在《水心学案序录》中说：“水心较止斋又稍晚出，其学始同而终异，永嘉功利之学，至水心始一洗之。”即将薛季宣、陈傅良等人的学术直接称为“永嘉功利”之学。^①后人更是将经世致用的大功利，庸俗化为各种立竿见影的现实功利，

^① 《宋元学案》第3册，第1738页。

甚至是个人的私利。其实前引叶适之论，已经将永嘉功利之说阐述得很清楚，一是以利与人，道义光明，这是针对圣贤儒者而言；一是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这是对所有人而言的。我们前面说过，其实叶适这种以利和义的思想，与我国古代从农耕文明与传统价值观念发展出来的传统的工商业的价值观是很接近的，并且有渊源关系。从上述所言可知，作为一个学术史课题的永嘉学派，对它的研究还是十分缺乏的。本书中所收的《永嘉学派诗经学述论》，就是强调永嘉学派作为经学流派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希望通过永嘉学派诗经学的研究，恢复南宋诗经学的全貌。永嘉学派的诗经学，在其当代和后世都有影响，是应该深入研究的。永嘉学派在经学其他领域的研究成就，也值得做深入的专题性研究。笔者认为，永嘉学派在学术史上最大的影响，还是在史学方面。永嘉史学导源于事功经制之学，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史学，却通过这个径路，发生全新的史学理念与方法。永嘉史学具有体大思精与考信求实相结合的特点，这是史学的向上一路，也是后世浙东史学的发源。但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叙述浙东学术的谱系时，却完全遗落了永嘉学派。收入本书中的《论浙东学派的谱系及其在学术史上的位置》，尝试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永嘉学派在学术史上应有的地位。永嘉学派应该是温州地域文化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但也是难度最大的课题。

四是关于王十朋、夏承焘的研究。王十朋是温州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可以说是温州历史人物中最具贤哲形象的人物，在南宋前期的政坛与学界都具有较大的影响，张浚曾向孝宗推荐虞允文、汪应辰、王十朋等人，认为可备执政之选。王十朋对温州地区士俗风气具有经久的影响。他的人格行为、哲学思想与文学创作，都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本书中《王十朋和他的会稽三赋》，是应《文史知识》绍兴文化专辑而写的。《会稽三赋》在赋史上有一定地位，其实是王十朋的文学创作中影响最大的一个作品，有多

种版本流传,值得深入研究。《王十朋与〈荆钗记〉本事之谜》,则是尝试利用地域文献资料包括口传来研究解释《荆钗记》与其原型之关系。《论南宋名臣王十朋的学术思想与生平业绩》则是为纪念王十朋诞辰九百周年而作,此文较有新意的地方,可能还是探讨王十朋的学术渊源的部分。通过对王十朋作个案研究,对于从中唐至南宋前期的古文派的流变可得到新的理解。作为一名具有一定历史地位的地域名人,王十朋研究可开拓的余地还是很大的。夏承焘是现当代温州学人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其与温州地域文学传统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代表了二十世纪文学史研究中融合新旧的一种学风,对于当前的诗词创作与古典文学研究都有启发。近年来,温州乐清连续两次召开有关夏承焘专题研究的学术会议,这种情况,在当代学人的研究中还是少见的。温州历代文学家值得研究的还有不少,如林景熙、李孝光、何白、孙衣言,他们的文学创作都有很高的成就。

五是关于本家乐清钱氏家族的文献及谱牒研究。钱氏家族是两宋时期温州地区的文化士族,在两宋时代的温州士族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出现过在地域内外都有较大影响的钱尧卿、钱文子、钱易直、钱木之等人。其中钱尧卿长于《周官》之学,对稍后的叶适等人可能有直接的影响。钱文子、钱易直都是永嘉学派的成员。钱文子曾从陈傅良、徐谊问学,与叶适可能存在学侣的关系。钱文子的《补汉兵志》是永嘉学派史学的代表作之一,对清代《二十五史补编》有直接的开启之功,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一直没有得到重视。钱木之是朱熹高弟,是朱学在温州的主要传人之一,也是《朱子语类》的记问者之一。本书收入笔者近年整理、研究乐清钱氏文献的部分成果,相信对于温州地区的家族与谱牒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其实家族研究、谱牒研究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学术。如何对其做出科学的整理与研究,是今后文史研究者需要继续思考的问题。

地域文化研究的空间是很大的。我个人认为，近年来学术的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许可称为学术的普遍化与普及化。学术不再只集中于学院与研究院的专业学术研究者群体，而是向下推广，在民间与地方悄然兴起。地方与民间的学者群正开始形成，非专业的学术研究者群也正在形成。在学院与专门研究机构的学者群深受体制捆绑、学术严重异化的情况下，这种地方与民间学术的兴起，似乎让我们看到了学术发展的另一种前景。作为一种天然的条件，民间学者群往往是以地域文化研究作为其基本的平台与起点。这也可以说是地域文化研究对学术的另一种功能与意义。

目 录

前言	1
有关“温州研究”或“温州学”的一些看法	1
古代“东瓯国”杂考五题	11
一、说“瓯、沤”	11
二、古代瓯人与商周朝贡体系	15
三、东瓯王“驺摇”的姓氏与取名之义	18
四、东瓯国与古徐国的关系	25
五、从鸡卜、铜鼓看东瓯与西瓯的关系	27
论历史上温州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兼论有关地域文化研究的一些问题	31
南戏与宋代温州地域文化关系新探	61
诗的国度、诗的家园	81
一、中国为什么可以称为诗的国度	81
二、《千家诗》中的温州人作品	86
三、温州古代诗歌的发展历程	89
四、四灵的诗风	95
论浙东学派的谱系及其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位置	
——从解读章学诚《浙东学术》入手	99
永嘉学派《诗经》学思想述论	124
试论“四灵”诗风与宋代温州地域文化的关系	161
古代小说中的温州人形象	187